

白崇禧別傳（四）

謝康

「六一」事變局面一新

民國二十五年這一年，是我們中國的災禍將近來臨，出現一些很驚險的鏡頭，有幾件與抗日問題有關而在這一年發生的大事。

自從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我東北。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又侵略我上海，發動



任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時的白崇禧。

淞滬戰爭。接着於三月十九日唆使漢奸鄒孝胥等擁清廢帝溥儀（即以前的宣統）在長春成立偽「滿洲國」，改元「康德」年號，實行將東北四省劃出於中國領土之外，由日本來統治。二十四年十月，日本侵略勢力到達了華北，唆使漢奸殷汝耕等在北通州，組織「冀東自治政府」。二十五年年初，日本又要求我「冀察兩省特殊化」及「華北五省自治」。敵人的兇殘氣餒，更着着進逼，我中央政府一面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一面積極備戰。全國人心受了這些嚴重的刺激，尤其是愛國青年，紛紛舉行救國運動，要求出兵抗日。兩廣人士尤為憤慨，就在這個時局嚴重的時節，黨國元老胡漢民先生氣憤成疾，病逝於廣州，舉行國葬。這一年六月，兩廣有所謂「六一運動」，十二月，有「西安事變」，第二年七月盧溝橋事變

全面大戰才爆發。

兩廣「六一事變」係「西南政務委員會」所策動，於六月一日，以抗日為名，突然出兵入湖南境。但為中央軍所阻，廣東將領如余漢謀、李漢魂等亦通電表示服從中央，反對內戰。其結果是陳濟棠垮台，失掉了「南天王」的地位，於是通電下野，出洋遊歷。率同他的高級幹部林翼中、黃麟書、區芳浦、林植槐一行人等到歐洲去（那時我正在日內瓦國聯工作，經由朋友的介紹，於是和幾位朋友，招呼他們，同時為他們開了一星期的每日上午各一次的「學術座談會」。並抽暇作義務嚮導，帶他們到各處參觀遊覽，但絕口不談國內政治及六一運動事）。不久行政院長孔祥熙因慶賀英王（現任英女王的父親）加冕，也到了歐洲，與陳濟棠接洽的結果。抗戰期間，陳濟棠出任中央政府行政院農林部長，（其後改任海南島行政長官，來台後於四十四年病卒。）

廣西方面，於陳濟棠下野後，即與中央取得聯繫和諒解。由健生先生偕同協調人員張繼（溥泉）、居正（覺生）、朱家驊（昭先）等飛到廣州晉謁委員長 蔣公面談一切，隨即達成「協議

軍訓而外，所有重大戰役，幾乎「無役不與」(參與督導)。他時常奉命赴戰地督師，如長沙會戰、鄂東會戰、台兒莊會戰及崑崙關會戰，這幾次大戰役，都獲致了輝煌的戰果。茲略簡述如左：

長沙會戰三次奏捷

七七抗戰的明年，為武漢保衛戰及台兒莊大戰告捷，又明年為長沙第一次大會戰。日寇佔領了武漢三鎮以後，又佔領了廣州，於是企圖打通粵漢鐵路，從日本調來許多師團，向我湖南長沙外圍，作大規模的侵略戰，一共使用了六個師團的兵力，成立對華派遣軍總司令部，企圖一舉而擊敗我方的主力，從速解決「中國戰場」的戰事，征服中國本部的心臟地帶和供給軍糧的洞庭湖穀倉，逼使中國投降，然而這只是一個瀕於幻滅的夢想！

這時期正是中日戰爭第二期的開始，歐洲第二次大戰即將爆發，德、意、日三國軸心，已經形成，敵寇侵略氣焰，仍然囂張，到處瘋狂濫炸。(以重慶陪都受禍為最慘)漢奸汪精衛，正在受日本人的指使，進行於偽滿洲國之外，組織一個以汪逆為首的偽「國民政府」。但漢奸傀儡組織，違反國家民族的大義，不得民心的支持，其必歸於滅亡，乃是無可逃避的命運。

日寇既造成汪記漢奸政權，同時直接間接受示向我。蔣委員長求和，我方絕不屈服，拒絕與敵談和，無論如何，都堅持抗戰到底。我政府為提高全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及支持長期抗戰的精神

和力量起見，乃頒布總動員綱領和實施的辦法，(這也就是白先生提倡「總體戰」的意思。)並發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當時所揭發的口號，極為顯著而能發生力量，即：

1.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2. 軍事第一、勝利第一。
3.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此外並厲力國民公約與國民月會，簽訂十二項公約，立誓不與漢奸偽組織通款及合作，隨時注意檢討加強履行公約所規定的事項，因此人民精神益加振奮，絕大多數人有與國家共存亡的決心，漢奸偽組織乃無所施其技。而在敵人佔領區內的敵後游擊戰術，亦因白副參謀總長的提倡之後，備受各方重視而加強推行，在當時都發生很大的效果。大家都都相信：「漢奸必敗，侵略必亡。」在國際上有許多主張人權正義的團體，紛紛表示對我同情和援助，其中最著名的是「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這個會，我在巴黎和日內瓦參加。中國分會則由鄭彥委員主持，推舉宋子文及李石曾先生為正副理事長。抗戰中晚期，我到重慶，和倪文亞、繆培基、梁大鵬諸兄，都參加分會的工作。)

敵寇對我軟硬兼施，一方面是和平攻勢，另一方面是加強軍事進攻。二十八年八月下旬，敵軍發動所謂「贛湘作戰」向長沙外圍實行大規模進犯，以四個師團的兵力，(作戰時每一師團的官兵約二萬人)由湘北南下，另以兩師團由贛北西向，分為六路會攻長沙。我軍在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及長沙守將薛岳指揮之下，分路予以迎

頭痛擊，或從正面堵截，或從側面及背面攻擊，苦戰二十餘日，我軍大勝，敵軍死傷四萬餘人，遺屍兩萬餘具，十月八日，我軍收復長沙附近新牆河、汨羅江各重要陣地。

這是第一次長沙會戰的大勝利。

第二次長沙大會戰，發生於民國三十年九月初至九月底。敵軍用十二萬兵，四百門大砲，一百五十架飛機，和一百輛坦克車與裝甲車，與我軍戰鬥了二十多天，死傷官兵四萬一千五百餘名，然後向北潰退，這是長沙第二次大捷。

三十年十二月下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軍又強渡新牆河，於三十一年一月二日，攻抵長沙近郊，我守禦長沙的部隊，在薛岳長官指揮下，奮勇迎擊敵人，苦戰數日，敵軍不支，潰退至岳陽原佔領地。至一月十五日，我軍完全收復新牆河，這是第三次大戰。敵方損傷之多，超過了前兩次。

經過長沙會戰三次大捷，我全國軍民對抗戰必勝的信念，大為加強，何況日本不自量力，又挑起太平洋戰爭，與英、美、法各國為敵，使歐戰與中日戰爭合流，成為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局面，因此日寇的敗亡，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台兒莊會戰挫敵鋒

中國抗日戰爭第一次打了個大勝戰是台兒莊會戰。自南京失守，我最高軍事當局，即釐訂作戰方針，為確保徐州，誘致敵軍集結於津浦鐵路沿線，俾得爭取時間整備戰力，以保衛全國交通中心及由南京西遷的首都各機關集中地的武漢三

「決定廣西服從中央，由中央撥款協助廣西建設。於中央決定抗日時，廣西即起而響應。廣西軍事及政治工作，仍由李、白及黃旭初主持，並組設廣西綏靖公署，由李與白分任正副主任，張任民為參謀長。會談結果，非常圓滿，一場誤會，終於煙消雲散。」

團結抗日參加戎幕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由於日軍擅自在蘆溝橋演習，並藉口一名日兵失蹤，向我宛平縣的守軍開火，我守軍吉星文部奮起應戰，揭開了抗日神聖戰爭的序幕。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在廬山會議上發表犧牲已至最後關頭，實行總動員，決心抗戰到底的聲明，獲得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大家眼見或耳熟能詳的數十年來日寇侵略的傷心史，和所造成的屈辱國恥，這時莫不義憤填胸，以極度興奮的心情，迎接這個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以報國仇雪國恥的機會。於是全國同胞一致團結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服從領袖的號召，抗日到底，雖犧牲身家性命，亦在所不惜，以勝利及收復失地為第一，不達目的，誓不休止。而在早已提倡「焦土抗戰」的廣西，更是義不後人，首先電告全國，擁護蔣公領導神聖的抗日主張，並希望大家一齊起來，和鬼子們拚個到底。

這個正義的強大呼聲，作為長期抗戰的開始，震驚了一向視我為一盤散沙的日本鬼子，打破了他們「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計劃，同時也震驚了全世界。世界各國，對這怒吼的「中國醒獅」，都刮目相看，而且一致的叫好。（我那時

也在歐洲從事抗日後援及國際宣傳的工作，所接觸的外國人士，很多都對我國表示同情的敬佩。而和我同時在國聯工作的日本人都垂頭喪氣）。

中央政府於八月四日派出一架軍用飛機來迎接白健生先生前往首都南京，參贊戎機。當白氏飛到南京之次日，日本各大報紙都用大字標題，報導「戰神到了南京！」從這件事，可知白先生在日本人眼中的地位。

白先生抵步後，即被任命為陸、海、空軍最高統帥部軍事委員會的副參謀總長。（參謀總長何應欽，和他的交誼很好，彼此合作無間）回溯北伐時期，白先生曾經擔任蔣公的參謀長，卓著助勞。這次蔣公又借重他的戰略長才，可謂「前度劉郎今又來」了。

白先生就職以後，參加軍事上的各種重要會議，並協助蔣委員長籌劃組織大本營。工作非常忙碌，又要會見舊日的老朋友。（多是中央的要員，）每天非到深夜，不得休息。有些廣西幹部曾經是他的下屬的人，想去看他，只有在他夜深休息的時候，勉強談上幾句話，即行退出，否則便要耽擱他睡眠時間了。

白先生這次赴京任職，住的是張學良的公館，在陵園附近，屋子雖不很大，但內部陳設相當華美，名貴的地板上，鋪滿了厚厚的柔和的純羊毛地毯。有些跟隨白老總來京的官兵，就將地毯來代替榻榻米，據說比較睡在本省人所慣用的木板床、竹床或繩床上還要舒服。可是，這間華美舒適的屋子，是在西安事變的前夕才蓋好，他的主人張少帥，一直沒有時間來住過。現在却是鶻

巢鳩居，變成白副參謀總長的臨時公館了。

提倡游擊戰總體戰

除副參謀總長職務以外，白先生這時還兼任軍訓部長。（何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其後並受命兼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行營主任，贊襄中樞最高軍事當局的決策，獻替甚多，動輒有關國防大計。他曾在武漢最高軍事會議中，提出建議，認為敵我雙方裝備既顯分優劣之不同，若純然採用正規戰，必然難於制勝。因此，亟應發展游擊戰術以配合正規戰，從敵後困擾敵軍而消耗其實力，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不必重視一城一鎮的得失（因為勝敗乃兵家常事），最重要的是以全力爭取最後的勝利。此議一經提出，即蒙最高統帥接納，並通令施行。又有所謂「總體戰」(Total war)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元帥呂登朵夫(General Ludendorff 1865-1937)所提倡，即由交戰國動員其全部力量，包括政治、經濟、科學、工藝等，並運用一切手段及人力物力、從海、陸、空各方面，不分敵前敵後，進行現代化的全面戰爭之意。呂登朵夫著「總體戰」一書，所見頗為新穎，各國文字多有譯本。（我國防部當亦有中文譯本）備受重視。白先生曾略師法其精義，制訂了適合於我國國情的「總體戰方案」於抗日戰爭末期及勝利後極力提倡，以適應作戰的需要，發揮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力量，期能藉此弭平共匪的叛亂。可惜未及實施，而匪禍已如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大陸了。

回溯抗戰八年，白先生除運籌帷幄，並實施

鎮。將河南東部，山東南部至長江以北津浦路線一帶劃為第五戰區，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兼安徽省主席），將南京以北的國軍，統交由李氏指揮。稍後並任命白崇禧為軍令部部長。當台兒莊魯南縣聯合兒莊會戰展開時，白氏曾至五戰區長官部協助李宗仁指揮作戰，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亦親蒞鄭州坐鎮，並到徐州前方指示機宜。

台兒莊大捷為二十七年四月七日，早於長沙第一次大捷一年零六個月，影響全國人心及國際上的觀感，非常重大，（那時筆者在日內瓦作國際宣傳，即以台兒莊大捷為最好的宣傳資料之一）

這次參加作戰的將領及部隊很多，有湯恩伯、張自忠、孫連仲、李品仙、廖磊、徐源泉、楊森、于學忠等名將及其所部，悉投入戰鬥。從三月下旬至四月七日，經十餘日之苦戰，終於殲滅敵軍中著名的磯谷師團及板垣師團，斃敵三萬餘人，虜獲大砲及輜重甚多，當時副司令長官李品仙將軍有詩為證：（三首錄二）

(一)

「連營百里正陽關，刀戟寒光耀九寰。
八桂精英來嶺表，兩淮豪傑起田間。
旌旗遠蔽符離野，壁壘橫跨大別山。
收復神京朝夕事，蝦夷斬罷寶刀還。」

(二)

武衛營前柳邑鋪，漫天烽火掣征桿。
登壇飛將驚三島，越海么魔擾五湖。
固築長圍新壁壘，便教頑寇墜冥途。

慶功筵奏鏡歌曲，螻蛄當車奈若愚！

崑崙關保衛戰經緯

崑崙關保衛戰，一稱桂南會戰，戰場最初在廣東的欽廉，然後進入廣西南部，最後在南寧與賓陽之間的崑崙關作戰。時間從二十八年十一月五日，敵軍兩師團，一旅團，海軍陸戰隊及陸海軍航空隊等約十餘萬人，從欽州灣登陸，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我軍再度奪回崑崙關要塞，將敵寇中村旅團長及其以下的殘敵八千餘人悉數殲滅之日止，歷時大約將近兩個月之久。

崑崙關在蒼寧縣東北崑崙山上，居高臨下，頗為險要，為兵家必爭之地。在昔宋仁宗皇祐四年（西元一〇五二），狄青南征侂智高，駐節賓州（即今之賓陽縣，影星林黛的故鄉），元宵節張燈設宴於軍中，乘敵人不備，潛引兵渡關，大破侂智高軍，所謂「上元三鼓奪崑崙」就是。相距九百餘年，而有中日戰爭中崑崙關之大捷。前後互相輝映，為此一山地增光。

這次桂南會戰，我軍以桂林行營白主任為總指揮官，動員部隊約十五萬多人，飛機一百架，參戰的著名將領，有夏威、蔡廷鍇、鄧龍光（此人最後當選國大代表，早幾天在台北逝世）徐庭瑤、葉肇及張發奎、陳烈、杜聿明、甘麗初、韋雲淞等。戰爭結果，消耗敵人實力頗大，國際上對我的觀感，益另眼相看。於是美國決議對華貸款，英國宣佈尊重九國公約及中國領土主權，開中英合作之先聲。

俄帝侵華毛共叛國

近代中國的災難主要來自東方的鄰國日本和北方的鄰國俄羅斯。回想一百多年以前，鴉片戰爭後沒多久，林文忠公則徐，已經指出中國真正之大患是北方的俄羅斯國（舊譯「羅刹」）。他以為俄屬中央亞細亞大陸對中國的邊防而言，其重要性遠超過於東南沿海的邊疆。當鴉片戰爭時代中國所喫虧的是西洋的船堅砲利，是海軍的勢力而不是以陸軍為主的時候，林文忠公竟有這樣的預見，認為我國的大患，乃是這個北方的大熊，而不是米字旗下的哈巴狗，（指英倫三島）也不是北海道的那些蝦夷（指日本）或歐美的任何強國。這一百多年，如果我國朝野上下能够由林則徐的預言注意到滿清時代的帝俄侵華史：從康熙二十八年（西元一六八九）的尼布楚條約到一八九五（光緒二十一年）的帕米爾失地共為六百一十七萬平方里，約略等於全中國三分之二的面積這麼大。而到了民國時代，西元一九二一年唐努烏梁海的全部失地以及一九四七年外蒙古的全部失地合計，又為一百七十餘萬方里，那是蘇聯成立以後在第三國際統戰手法之下的侵華事實。當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國父手著「中國存亡問題」曾經痛心疾首地陳述俄國勢力向南發展，我們中國以至亞洲都將有陸沉的禍患。國父這種卓見與林文忠公的預言，都是深謀遠慮，英雄所見略同。可是，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對於俄帝侵華的野心和事實，都未能充分的注意和提防，對於蘇聯御用的第三國際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的

顯覆活動，統戰手法，種種欺騙叛亂的行爲，例如將暴力滲透糖衣的謊言和變亂真理的手段，交互使用，「談談打打，邊打邊談」，和戰不分，以和養戰，口頭上一切是爲的民主和平，骨子裏却是爲發展武力，以槍桿子奪取政權，實行其階級獨裁，軍事統治。慣用刺刀和謊言來維護他們所謂「解放區」的「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惜儘量



白崇禧(右)任國防部長飛太原視察與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左)合影。

犧牲人民的生命、財產、個人的自由快樂與尊嚴。他們一切惡毒的危害國家利益民族生存的手段，我政府和民衆以前都未能充分注意提高警惕而加以有效的制裁。尙未身受其害的一般民衆，固然不能認識共黨的猙獰面目，更無足深怪。最令人痛心的是抗日戰爭的末期及勝利的初期，許多人稱「民主人士」的投機知識分子，失意政客，如所謂「民主同盟」、「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農工黨」、「致公黨」之流，甘作共產黨的尾巴；以及像雨後春筍般紛紛組織的小政黨不下八九十個之多。和所謂社會賢達等等。他們之中，或有些富於愛國熱忱，但亦不少同情中共，沉湎一氣的人。而迫使國民黨開放政權，則爲黨外人士的共同願望。我還記得在這時期，中蘇友好協會利用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在重慶舉行了一個蘇聯的政經文物展覽會，(名稱記不清楚了)，那時前往參觀的人，絡繹不絕，似乎都抱着一種羨慕和讚美的心情，以爲蘇聯的確是人類進步的象徵和代表。既然對蘇聯有了十分的好感，那麼，對他所提攜羽翼而成長的中共，自必發生幾分同情，不在話下；也許更進一步認爲它是戰後新中國的希望所在呢(？)

二次大戰後的世局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的部份結束時，蘇聯已大發其意外之財，並在東歐發展其影響，組織了不少的衛星國，作爲他的附庸

，十足形成他的共產帝國主義的氣派。不久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天皇，宣告投降，而蘇聯又是捷足先登，佔我東北，搶先接受日本關東軍的繳械投降，獲得數以百萬計的最精良的武器裝備，並將它全部交與在黑龍江邊佳木斯的土匪總部，而壯大其對我政府造反的實力；同時還指使外蒙古騎兵及高麗(金日成)兵團以爲之助。事實上不管第三國際是否存在，蘇聯是以全世界共產黨發號施令的後台老板自居的，毛共也像東歐的衛星國一般，作爲它的附庸，聽命唯謹，並不例外。至於美國杜魯門總統、艾奇遜國務卿和馬歇爾特使之流，他們固然不很認識共產國際世界革命的陰謀，同時也爲毛共冒稱「土地改革黨」與蘇聯沒有關係的虛偽宣傳所蒙蔽，多少同情毛共而不贊同我政府軍事佔優勢時的剿共行爲。又深恐因我國與蘇聯直接衝突而鬧成「第三次世界大戰」。於是對我諸多阻撓，而對毛共的要求，則儘量予以方便俾得乘機擴充其力量。美國後來甚至發表所謂對華「白皮書」，表示美國不再過問中國的事情，聽其自然演變，這對我當然又是一大打擊。

在這種局勢動盪不安的情況下，中國八年抗戰最後勝利的日期來臨後，接着政府改組，三十五年六月，白崇禧出任首任國防部長。陳誠爲參謀總長。在主席 蔣公授權及領導下，努力於國防建設工作，特別從軍事方面來保衛國家的安全。所可引爲遺憾的一件事，是當時的國防部中，已被共諜滲透，因國防部次長劉斐(維章)，是一名共黨分子，而白陳兩氏竟被蒙騙而未察覺，這

對於剿匪戡亂的工作，就難免不有洩漏機密的危險了。（按照當時國防部的組織法，參謀總長職權很大，他可直接秉承國府主席以統率三軍而不受國防部長的節制，等於以前日本軍部的「帷幄上奏」，直接於天皇，而不受內閣的管制。）

提倡總體戰的經過

至於白氏在抗戰末期所提倡的「總體戰」到他就任國防部長以後，更提綱挈領，制訂「總體戰綱要」（參見所著：「全面戰爭與全面戰術」）以適應剿匪需要，希望能發揮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力量，動員全體民衆，加強組織，及戰鬥功能以消滅共匪。這個戰略，原是呂登榮夫元帥由德國軍事學家克勞維茨「戰爭論」中的一句話引申而來的。克勞維茨說：

「戰爭是借助於其他手段之政治的延續。」由於蘇俄共黨頭目他們精研了這句格言，使戰爭和戰爭的威脅，變成一個連續不斷的政治過程，以求滿足他們的需要，而始終不改變其政治目標。蘇聯運用這種戰略，已收了很大的效果，共匪又從「蘇聯老大哥」那裏，學會了這絕招，加強他統戰的力量，收效也相當的大。白崇禧將軍想用總體戰來對付共匪，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倘能各方面互相配合，我相信當年大陸的剿匪軍事，縱然有許多客觀的和人爲的因素不利於我們，也不至於失敗得那麼快吧（？）當白先生於三十五年暑假回到桂林演講時，曾經對我們大談他底總體戰理論和運用之妙，並分析當日敵（共匪）我雙方實力的對比，認爲如能不受「

和談」（共匪緩兵之計）及停戰令的約束，我們仍然有戰勝的把握。儘管那時長春及哈爾濱等處，曾經一度失守，但國民政府於忍無可忍之下，毅然將停戰令取消，於是國軍就很迅速的收復長春等處失地。白先生說這不是可以證明我們有把握勝算的可能嗎？

大陸淪陷五大因素

我不打算在此處多論述白先生當年對國事的意見，也不忍追溯我們在大陸失敗的傷心史，下文只是將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而認爲中日戰後共匪得勢，大陸所以淪陷的幾點最重要的原因，略爲提及罷了。

第一、中共爲共產國際支部，有蘇聯大力支持，而我則無國際援助。美國不獨不助我，反而與蘇成立雅爾達密約，並爲共產黨虛僞宣傳所惑，搞國共和談，脅迫我下停戰令，造成約束我國軍的一個絆腳石，反有利於匪方的發展。

第二、共匪在抗戰八年中，已壯大了力量，而我方的總體戰略，制訂得太遲，匪方則早已由蘇俄傳授，先我着鞭。並以鄉村包圍城市及人海戰術這兩套攻戰的策略取勝。也可以說我們在防共和剿共方面，多少失了機宜。

第三、抗戰勝利，共匪一方面拼命宣傳僞軍該殺，阻止我收編僞「滿洲國」的軍隊，一方面他得到於日本投降時已入據東北各重要據點及交通路線的蘇俄軍隊的協助，利用停戰機會，却自行招誘僞滿軍隊入夥，使其實力陡然膨脹得很多很快。於是抗戰的初期僅有的一支八路軍，戰後

匪軍號稱百萬以上，乃形成爲毒遍全國大陸的滔天紅禍。

第四、在政治、軍事各方面，我方的確有許多弱點：例如民生主義尙未實行、土地問題未能解決，農民生活艱苦。加以抗戰八年，許多城市已遭破壞，又飽經日寇及共匪的劫掠，真是「爭地爭城與殺運，生靈塗炭幾時休」，戰區內多數人民受災慘重。加以各省兵役行政辦理遠不及今日台灣之完善，戰後又未能復員，許多壯丁之家（所謂「出征」軍人家屬）不免心存怨望，大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之歎！（語見詩經）。又傳說不少師旅長以上的高級軍官，在抗戰後期，或不免有愛喫「空額」或尅扣軍餉，以飽私囊的行爲。但在另一方面「法幣」（即中、中、交、農四大銀行所發行的鈔票）不斷貶值的情況下，士兵喫不飽，穿不暖，戰鬥精神日漸低落，因此發生厭戰或逃亡回家的思想。至於那種少數貪污發財的將領，正是腰纏十萬貫，準備將來作海外寓公，當然更不願犧牲享受，爲救國救民而效忠領袖，拼命作戰了。我方這些弱點，正如于右任院長於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政府要員會議席上所說：「本黨自己不爭氣，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所以弄到今天無力對付共匪，怎麼不令人痛心呀！」現在事過境遷，回顧前車之覆，可作後車之戒，那就更不必諱言了。

第五、最重要的還是財政金融問題。溯自抗戰中期以來，我國貨幣大量貶值，民生備受影響。戰後通貨膨脹速度加快，物資更普遍缺乏，士、農、工、商各界及軍公教人員，俱受到貨幣價

(四) 傳別禮崇白

值朝不保夕早晚時價不同的情況所困擾，民怨因而沸騰，各機關行政及軍隊作戰效率均隨而低落。政府迫於無奈，於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頒布改革幣制的命令，發行「金圓券」，以一元折合舊法幣三百萬元計算，但只能安定於一時。不到四個月的時間，金圓券即陷於與舊時法幣同樣的惡性通貨膨脹的噩運。乃改發「銀元券」，不料這銀元券更得不到人民的信用。這時政府已播遷廣州，前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為廣東省政府主席，他雖是財經專家亦無法挽救。廣州市面上只通用香港鈔票、(港紙)和銀圓(即光洋)或美鈔，對於政府發行的鈔票，廣州話叫做「濕柴」，意即燒不着的廢物，這時候一點兒用處也沒有了。國家的貨幣金融弄成這種混亂的情況，政府財政萬分支細，對軍公教人員發不出薪餉，(士兵們要求每月兩塊銀元而不可得，)人心士氣不問可知。前方大將湯恩伯在上海，白崇禧在華中一帶的戰亂軍事，均因此更難支持下去。更不消說：戰後四年的財政困難，捉襟見肘，大大的影響了政府為提高國民生活水準，恢復民族元氣以及促使國家進步與建設計劃的進行了。

宣撫台灣一段軼事

三十六年春天，台灣不幸發生「二二八」事變，地方秩序混亂，人心惶惑，謠言頗多，共謀乘機煽動暴民，好像火上加油，大有燎原之勢。政府關懷台灣同胞，特派國防部白部長崇禧前來宣撫，由於他的態度謙恭誠懇，處理有方，加以他的事功聲望，早為省內外民眾所敬仰，一言九鼎，終於將暴民之氣化為祥和，使地方復歸於寧靖。

這件事的成功和當時台北縣瑞芳鎮長李建興兩母子謁見白氏據實陳情為白氏所採納，白並以親切關念之情，對來謁者溫語嘉勉，大有關係。茲摘錄李建興先生敬悼白上將文中的一節，以作見證：

「……二二八事變，政府關懷台民，特派公蒞台宣慰。時建興適充瑞芳鎮長……遂於三月十七日，下午三時許，自台北三條通本宅陪同先慈(按李老太太，姓白，年已八十)乘人力車直赴台北賓館，蓋台北賓館為公駐節所在也。抵賓館後，當蒙閣者延入客廳休憩。不久，便見公借一翻譯翻然而至，公乍視建興，即含笑點頭，表示在南京一晤，尚留有印象。隨又向先慈含笑為禮，並溫語詢問來意。先慈道：『此次台灣不幸發生事變，全由誤會所引起。一方面台灣光復時間尚短，台灣同胞對於政府一切政令，尚未諳熟，在遵行時不免有誤解之處。另一方面由於省內省外言語不通，亦易發生隔閡。其實，台灣同胞，除少數山胞外，絕大多數，悉自內地移來，時間容有先後，而同屬炎黃子孫則無疑義。既然有此一脈相傳的深切淵源，台灣同胞絕無歧視外省同胞之理。何況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年，台胞所受痛苦，真是罄竹難書，好容易望到今日慶獲光復，解除桎梏，台灣同胞只有感激政府，那會喪心病狂，和政府作對？不過事變既已發生，總屬大大不幸，如何善後，則請部長從寬處理。』」

李老太太這番話，真是懇切陳詞，使白氏聽來深受感動，於是即刻答覆說：

「老太太這般大的年紀，為了台省同胞安寧，親自到來關說，理由也說得清楚明白，使我很同情和敬佩。我一定將老太太的意見，轉報中央，我想中央一定會批准的，請老太太和李先生轉告各人，大家放心好了。」

話一說完，建興先生跟着說：「報告部長，家母娘家也是姓白的，白先生於是就和李老太太認起宗親來，並詢問她的家譜，閒話家常，而他們兩家的情感也就從此建立起來了。二二八事變和平解決後，白氏即回京覆命，蔣公主席，大為欣慰。其後於三十八年冬天，大陸變色，白先生全家來台北定居松江路寓邸以前，曾寄居在旅社裏面。李老太太看到這種情形，乃囑咐他的兒子李建興在仁愛路二段購一相當寬闊的住宅贈與白先生，作為他的公館。不料白先生竟堅辭不受，以後雖多次勸他搬進去住，每次所得的回答，都是仍然拒絕如故。於此可見白先生廉潔耿介的素養，實為普通人情之所難能。他後來寧願居住松江路一幢國民住宅式的平房，全家十餘口，擠在幾間小屋之內，和他的身份頗不相稱。但他淡泊自甘，堅持不受二百餘坪的大第宅，凡是知道這件事的人，都認為這是平常的人所做不到的。其後白先生逝世，李建興先生輓以詩云：

一眠不起竟何因？上帝召回戰鬥神。
無疾善終歸樂土，靈思解救感台人。
遵循古道言行在，仰望遺容涕淚真。
幾度節臨謀國計，含哀拜謝保黎民。
這幾句詩，可證明台灣本省同胞對白健公的懷念。